


王学泰 著

中国游民

 上海远东出版社

王学泰 著

中国游民

遠東精選

 上海遠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游民 / 王学泰著. —上海: 上海远东出版社,
2012

(远东精选)

ISBN 978-7-5476-0509-7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流动人口—社会问题—
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D691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11391 号

策 划: 高克勤
责任编辑: 刘丽娟
封面设计: 李 廉

(远东精选)

中国游民

著者: 王学泰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地址: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邮编: 200336
网址: www.ydbook.com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制版: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: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装订: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版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印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: 850×1168 1/32
字数: 67 千字
印张: 5.375 插页 3
印数: 1—3 2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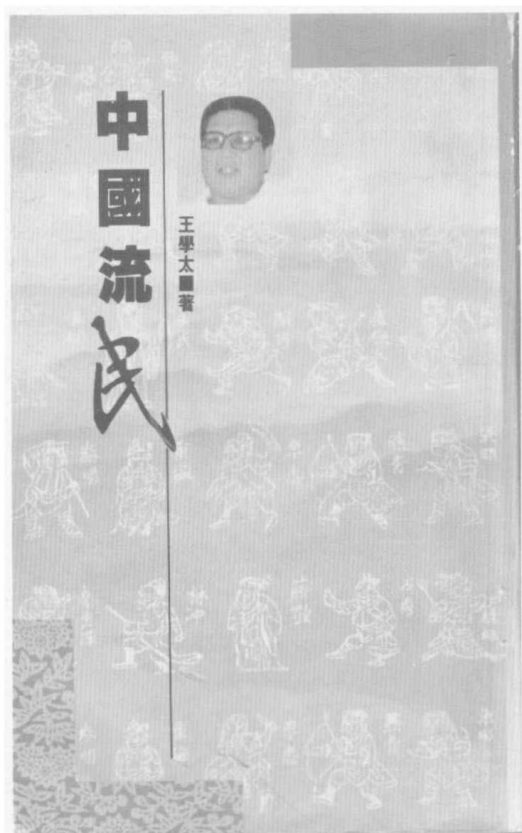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76-0509-7/G·363 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62347733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零售、邮购电话:021-62347733-8555





中华书局（香港）1989年初版

《中国流民》书影

小 引

本书原名《游民的理想与现实》，初版时原出版社编辑将书名擅改为《中国流民》。此次再版，易名为《中国游民》。

王学泰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

序

本书之核心是描述中国通俗小说与中国秘密会社之关系，说明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渗透和相互影响的。贯穿这两个似乎不搭界问题的线索则是游民。通俗小说的产生与游民阶层的形成有关，最早的一些通俗小说中也包含有较浓厚的游民意识（如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志演义》等）。这些小说对后世的游民及游民组织——秘密会社有着深刻的影响。游民们的政治理想、组织原则、价值观念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这些小说，并从这些小说中汲取斗争精神和活动策略。另外游民生活与游民组织活动的神秘性、传奇性、冒险性又成为通俗文学的重要题材，并给近代武侠小说作者许多启示。中国古今许多通俗小说都再现了游民的现实生活，同时又反映了其向往与理想。这些都可以在游民组织及其活动中得到印证。

游民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《礼记·王制》：

凡居民，量地以制邑，度地以居民，地邑民居，必参相得也。无旷土，无游民，食节事时，民咸安其居，乐事劝功，尊君亲上，然后兴学。

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，在这种制度下，田有常制，民有

定居,这时是无游民的。如果井田制有所败坏,农民、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职业,就成为“游民”。周代是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时代。这时的游民不是卷入武装动乱,就是沦为奴隶。即使参加了动乱,暂得扬眉吐气,失败后,免于遭杀戮的也大多沦为奴隶。因此当时的游民很难大量地在社会上长期存在。

秦汉之后进入了封建社会,这种情况有所变化。人口增多、社会震荡加剧,特别是波及甚大的天灾人祸都会导致大批的农民脱离自己的故土,在有领导能力的“渠魁”、“渠帅”带领下就食于富庶地区。这时的游民多称之为流民。

此书中所说的游民与此略有区别,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,其重要特点就在于“游”。也就是说,他们缺少稳定谋生之路,居处也不固定。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。这种类型的游民,只有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。

宋朝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与众多的朝代中,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朝代,它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许多方面都较以往的朝代有显著的变化。在城市结构上也是如此。宋以前的大城市多采取封闭的城坊制。所谓“城坊”,指城市被街道分割成若干坊,坊的四周筑有高墙,居民住在坊中,坊有门朝启夕闭。如隋唐的国都长安就是这种类型的城市。它有一百多个坊,商贾云集的东、西市与居民所住的坊分开。晚上坊门关闭,坊角有警卫,街道上有金吾巡道,不准夜行。这种城市容纳游民能力很差。到了宋代,大多数城市打破了封闭凝固的城坊,一变为市民居住区与商业区相互混杂的街巷制(与现在城镇类似)。北宋首

都汴京、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服务业都十分发达，许多食品店通宵服务，这为游民提供了糊口谋食的机会。北宋时期人口膨胀，土地兼并激烈，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生活极不稳定的游民。另外两宋还有一种特殊的游民，这就是士兵。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，对待士兵形同囚犯，使军人失去了自尊与自信。统治者推行的又是募兵制，其士兵多从游民、流氓、无赖、地痞中招募。这种失去了自尊又出身于游民的士卒，虽然穿上了军服，有了稳定的生计，但其群体性格与心态仍与游民相近，因之我们称其为特殊的游民。清入主中原后，八旗、绿营等士卒亦与此相类。

城市游民中也有少数有文化的分子，我称之为游民知识分子。这种人物的产生也始于宋代（这与宋文化教育相对普及有关，书中有论述）。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——文士，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，他们奋发努力的目标就是出仕做官。游民知识分子与他们的最大差别就是绝了做官的望，一生不以出仕为奋斗目标。他们又不是有田有地、可以赖以为生、高枕而卧的隐士。游民知识分子大多要靠为士大夫所不齿的职业或手段谋生养家。他们也多游荡于大城市，溷迹于社会底层，与游民打成一片，成为游民集团的首领或游民意识、情绪的表达者。这就是后世所称的“江湖人”，或名曰“走江湖的”。这种人在南宋和南宋以后逐渐多了起来，他们是宋代与宋以后（不包括近代以后）通俗小说的主要创作者。

游民们没有留下什么专著表达他们的意识与观念。我们之所以能谈论游民意识，主要是依据他们在历史与社会生活中的表现，再以游民知识分子所创作的、以游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加

以印证。

游民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其反社会性。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，所谓“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”。在这种垂直统治的社会中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纵向的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也必然是纵向的，因此，“忠”施之于君、施之于国；“孝”施之于父、施之于家，两者都是绝对的、无条件的。这是封建时代具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。游民是脱离正常社会秩序的群体，他们不可能完全认同这个主导的意识形态。因此游民意识的反社会性首先表现在对“忠孝”的贬低与背离上。他们把“义”提到第一位，并把它内涵加以改造和作出新的解释，使之成为游民之间横向联系的纽带。中国有句俗话说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”所谓“在家”也就是说其人没有脱离宗族乡里，从而有“父母”之可“靠”。要“靠父母”，则必须承认和履行孝道。而“出门”者，则可以理解为脱离了宗族乡里的游民。他们只能“靠朋友”，要靠朋友就要注重互助互利的义气。他们少谈忠孝，有时谈及忠孝也要作出符合游民利益的解释。“义”这个反映人与人之间横向联系的意识形态，必然对垂直统治的社会有所破坏，因之一些文士对“义气”大张挞伐也就不奇怪了。

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法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，它亦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。游民意识的反社会性还表现在其与儒家思想大相悖谬上。以小农生产为基础，以地域、宗法为联系纽带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中，有其愚昧、野蛮、拉帮结派、党同伐异与注重眼前利益的一面。但这不光彩的一面，往往被历代儒者所制造的“仁爱”、“忠恕”、“君子群而不党”、“君子忧道不

忧贫”等富于诗意的幻想所掩盖。一些正直的士大夫很看重自己在群体中的角色位置(如社会与亲缘关系中的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等),并能坚持做到传统与社会为这些角色所规定的一切。“四民”中的农民、手工业者、商人,只要他们有产有业,他们也要担负起宗法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角色义务。因此,儒家倡导的政治与道德规范给民族的群体性格塑造以深刻的影响,它也给中国封建文化的黑暗面涂上许多亮色。

游民与匍伏在角色规定下的“四民”不同,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,失去了角色位置(许多游民无妻无子,也没有人夫、人父的职责)。他们是没有根柢、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。他们没有地位,失去了社会的尊重;他们很少有文化教养,因此也就没有文饰的习惯。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盖的心态、性格、观念,而在游民看来根本没有掩饰的必要。因此在游民意识中,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。这一点必然与社会形成尖锐的冲突。

游民意识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缺少执著的理想,游移于是非之间;或者说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念,一切随缘而定。这一点与游民缺少生存保障有关。

存在决定意识。人与人群的性格、思想意识归根结底是由其经济地位与独特的生活道路决定的。孟子早就说过:“若民,则无恒产,因无恒心。”他对脱离固定产业的人们不肯认同正统意识形态表示忧虑。但他又说: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,惟士惟能。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。春秋战国时期“无恒产”而有坚定信念的士人也是极少数,大多数士人缺少超越个人需要的追求。战国时活跃在列国政坛的策士,哪个有

一以贯之的主张？都是以能够耸动人主，从而使自己得到高官厚禄为目的。只要能逞志于一时，对于持何种主张是不太计较的。像韩非那样的法家学派大师都要揣摩人主心理，从而投其所好，说以能为之首肯的理论，何况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之流呢？这些纵横捭阖之士除了求宠固位外，在理论观念上毫无定见，而且不以为耻。庄子看惯了这些，称之为“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”。在无是非观的影响下，本来十分注重理想信念的两大入世学派——儒家与墨家的末流也在世俗化、游士化。荀子的《非十二子》篇中就对“无礼仪而权势之嗜者”进行了揭露与抨击。《庄子》中还写了个儒生以诗礼发冢的故事。“诗”与“礼”这些被儒家崇奉为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物，竟被挖坟盗墓者用作点缀。墨子之徒本为侠之祖。鲁迅指出，战国以后“老实”的侠死完，“止留下取巧的侠”。他们早把摩顶放踵的利他精神丧失殆尽。儒墨尚且如此，何况贪权嗜利、鸡鸣狗盗之辈？游士风气在历史上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。它虽为正统儒者所否定，但在游民知识分子心中极易引起共鸣。他们不仅歆羡游士们发迹变泰的际遇，更称许他们不讲是非原则的投机手段。可以说，游民意识中的无是非观，也有其历史渊源。

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是封建社会的零余者，是封建阶级的附庸，而不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，更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。固然他们有反社会的一面，但他们不能提出新的社会理想，只能对既定的社会秩序滥施破坏，对长年积累的社会财富与生产力竭力摧毁，因而他们只能延长封建社会。

至于游民中的腐败分子——流氓，则完全是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。他们往往依靠偷盗、欺诈、赌博、拐卖、行骗、卖淫、欺压

良善等不正当手段为生，社会上种种阴暗、丑恶现象大都在他们之中滋生。他们愤世嫉俗，反对一切贫富不均，但同时又向往发财致富，并且不择手段，为财而死。他们既可劫富济贫，也会扰乱危害平民百姓，加剧社会矛盾。他们标榜江湖义气、四海一家，但又往往内讧内斗不断、为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反目成仇，聚众械斗，心狠手辣。他们既反对封建官府，又崇尚暴力、权威，他们既不满意当代最高统治者，又梦想辅佐圣明天子，做打天下的开国元勋，封妻荫子、福祿绵长。在斗争中胜则趋之若鹜，败则作鸟兽散，甚至沦为封建统治者的走狗。即使他们推翻了封建统治者，却马上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。其上台后对人民的压榨盘剥、压迫控制，丝毫不亚于旧的统治者，甚至其手段更为残酷野蛮。

前面说过通俗小说的产生与游民阶层密切相关。最早的一些通俗小说包含有浓厚的游民意识，其原因何在呢？我认为这与通俗小说作者及通俗小说性质有关。最初通俗小说的作者不是士大夫，而是游民知识分子、浪迹四方的江湖人。直至今世，演说评书者还以“一块醒木为业，扇子一把生涯，江河湖海便为家，万丈风涛不怕”（《江湖内幕》）自许。江湖艺人在编写与演说通俗小说时，必然渗透自己的意识与情绪，并将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入其中。另外，游民是脱离了生活常轨的人们，他们的经历必然充满了曲折与艰辛，他们与社会、人群的矛盾也更为尖锐，其生活道路的起伏跌宕远过于在社会常轨中生活着的人们。因此，演说游民的故事更富于戏剧性、传奇性，更能吸引听众，何况听众之中还有大批游民呢？因此，一些通俗小说中表现游民生活和反映游民意识是必然的。这些颇能反映游民意识的小说，

又对游民的生活与斗争发生强烈的影响，特别是人口膨胀、游民日增的近三百年间，游民在这些具有游民意识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下，演出了无数有声有色、波澜壮阔、威武雄壮的活剧。

目 录

小引	1
序	1
一 游民——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	1
(一) 应该引起注意的课题	1
(二) 游民的主要来源——破产的农民	5
(三) 人口的增殖与流民的消长	8
(四) 从流民到城市游民	10
(五) 从游士到游民知识分子	19
二 游民意识的载体——通俗小说	29
(一) 通俗小说的产生	29
(二) 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志演义》	33
三 游民的变迁与发展	58
(一) 游民的发展与群体组织化	58
(二) 两种不同的秘密会社	60

(三) 从通俗小说汲取思想的天地会	61
(四) 模仿宗法制度的游民组织——安清帮	121
四 秘密会社与通俗小说	126
(一) 游民的分化与清末侠义小说	126
(二) 会党活动的公开与通俗小说的流行	130
(三) 武侠小说中的帮会	140

一 游民——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

(一) 应该引起注意的课题

古今中外流浪者的歌声颇不少见，它往往能以苍凉悲慨、茫然若失的情绪打动人们，因为人的本质是要求有稳定生活和正常居处的。

《诗经》中的《黍离》^①、《黄鸟》大约是中国最早描写流浪者心态的作品：

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，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
（《诗·王风·黍离》第一章）

黄鸟黄鸟，无集于谷，无啄我粟。此邦之人，不我肯谷，言旋言归，复我邦族。（《诗·小雅·黄鸟》第一章）

《黍离》中的主人公在田间道路上漫无目的地彳亍着，望着密密麻麻的黍稷，心旌摇荡，对前途感到茫然。这种流浪生活是谁造成的呢？他仰望苍天而得不到回答。《黄鸟》的主题比较明确，南宋吕祖谦说：“民有失所者，意他国之可居也，及其至彼，则